

关羽读《春秋》背景刍议

梁 满 仓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汉末三国时期, 阅读《春秋》蔚然成风。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把《春秋》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及其他领域, 体现了古文经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关羽作为刘备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肩负着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 他是独当荆州一面的军事统帅, 面临着北伐曹魏、处理与东吴关系等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受社会风气的熏染, 他熟读《春秋》是时代、社会使然, 但其动机重在用《春秋》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生活提供借鉴, 指导军事活动和培养道德情操, 而不在《春秋》学问本身。

[关键词] 汉末三国; 《春秋》; 经世致用; 政治; 军事

[中图分类号] K23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824(2006)03—0019—05

《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说, 关羽被杀后, 人们在玉泉山为之立庙, 庙中楹联写道: 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 驰驱时无忘赤帝; 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 隐微处不愧青天。清人所作关羽庙楹联, 也“必以《春秋》为美谈”。^[1]如今我们看关羽的塑像及画像, 多为一手捋长髯, 一手捧《春秋》。可以说, 《春秋》和赤兔追风马、青龙偃月刀一样已成为关羽外在的物化形象之一。关羽喜读《春秋》, 史载确有其事。《三国志·蜀书》卷六《关羽传》注引《江表传》说: “羽好《左氏传》, 讽诵略皆上口。”《三国志·吴书》卷九《吕蒙传》注引《江表传》也说, 关羽“长而好学, 读《左传》略皆上口”。可见关羽与《春秋》关系之密切。关羽为什么会与《春秋》结下不解之缘? 读《春秋》的动机是什么? 本文欲对此加以探讨。

—

关羽所生活的时代汉末三国, 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已在社会上流传很广, 阅读《春秋》已在社会上蔚成风气。

早在东汉中后期便出现了一批古文经学大师, 他们在《春秋左传》的研究方面, 个个都有高深的文化修养和学术功底。如河南荥阳人服虔, “有雅才,

善著文论, 作《春秋左氏传解》, 行之至今。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2](卷79《服虔传》) 贾逵的父亲贾徽, 从古文经学家刘歆学《左氏春秋》。贾逵“悉传父业, 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 以《大夏侯尚书》教授, 虽为古学, 兼通五家《谷梁》之说”,^[2](卷36《贾逵传》) 可谓古今经双通的学者。马融“才高博洽, 为世通儒, 教养诸生, 常有千数”。贾逵、郑众所注的《春秋》在当时被称为郑、贾之学, 但马融仍嫌贾学“精而不博”, 郑学“博而不精”, 著《三传异同说》。马融的学生郑玄, 先“师事京兆第五元先, 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 后来“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2](卷35《郑玄传》) 对古今经文都很精通。

东汉瓦解后, 魏、蜀、吴三国鼎立, 喜读《春秋》的政治家、军事家及儒者更是屡见不鲜。

曹魏政权中的王朗, 曾做到司徒、司空之类的高官。他除了参与军国大事外, 还“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 奏议论记, 咸传于世”。^[3](《王朗传》) 王朗的儿子王肃, “善贾、马之学, 而不好郑氏”, 他采会同异, 为《春秋左传》作解, 与其他著作《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等, “皆列于学官”。^[3](《王肃传》) 贾逵最好《春秋左传》, 任豫州刺史时, “常自课读之, 月常一遍”。杜

[收稿日期] 2005—12—30

[作者简介] 梁满仓(1951—), 河北涿州人, 研究员,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秘书长, 学术方向: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

畿之子杜宽,以名臣门户,少长京师,而笃志博学,“经传之义,多所论驳,皆草创未就,惟删集《礼记》及《春秋左氏传》解,今存于世。”杜畿之孙杜预,大观群典,谓《公羊》、《谷梁》,诡辩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乃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3](《杜畿附杜恕传》)}并声称自己有“左传癖”。^{[4](《杜预传》)}曹魏大将李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博观群书”。^{[2](《李典传》)}率众灭蜀的名将钟会,12岁就“诵《春秋左氏传》”。^{[3](《钟会传》注)}上述诸人均为曹魏政权中军政要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名儒也以研习《春秋》著名。如乐安人孙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注书十余篇”。^{[3](《王肃传》)}贾洪、乐详在当时俱有“儒宗”之号,贾洪“好学有才,而特精于《春秋左传》”。^{[3](《王肃传》)}乐详少好学,建安初,听说南郡谢该善《左氏传》,乃从南阳步行至其处向其学习。并著成《左氏乐氏问七十二事》。^[3]大司农董遇自幼好学,早年在采稻负贩中常挟持经书,投闲习读,最后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亦善《左氏传》。^{[3](《王肃传》)}

在蜀汉政权中,精于《春秋》者也大有人在。如义阳新野人来敏,曾任刘备的典学校尉、太子家令等职,在刘璋统治益州时就已入蜀,史载他“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3](《来敏传》)}梓潼涪人尹默,曾任刘备的益州牧、劝学从事等。早在刘备入蜀前,便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学习古文经。“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对刘歆、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等人所注的《春秋》,“咸略诵述,不复按本”。刘备入蜀后,又受命“以《左氏传》授后主”。^{[3](《尹默传》)}益州人李密也“治《春秋左氏传》,博览多所通涉”。^{[3](《杨戏传》)}

在与蜀汉鼎足而立的孙吴政权中,许多军政要人也与《春秋》有着密切的关系。老臣张昭,“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在里宅无事,乃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3](《张昭传》)}诸葛亮早在为孙吴效力前就曾游学洛阳,“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3](《诸葛亮传》)}孙权曾劝大将吕蒙、蒋钦读些书,吕蒙说军务繁多,没有时间。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从此吕蒙折节学问,笃志不倦,学有所

成,令鲁肃刮目相看。^{[3](《吕蒙传》)}交阯太守士燮,幼年曾游学于洛阳,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任交阯太守后,仍“耽玩《春秋》,为之注解”。陈国袁徽写信给荀彧赞士燮说:“交阯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官事小阙,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3](《士燮传》)}广陵人张纮曾任孙权长史,幼年游学洛阳,于外黄从濮阳閼受《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3](《张纮传》)}河南人徵崇曾任孙权率更令,笃学立行,“治《易》、《春秋左氏传》”。^{[3](《程秉传》)}吴郡人沈珩曾任孙权西曹掾,“少综经艺,尤善《春秋》内外传”。^{[3](《吴主传》)}

综上所述,研读《春秋》在三国时不是个别现象,它遍及魏、蜀、吴三国,出现在政治家、军事家、学者等各种社会群体中。关羽的熟读《春秋》不是偶然孤立的,是当时这种社会风气影响的结果。

二

如果我们更深一步研究就会发现,上述三国研读《春秋》风气中,各社会群体所读的《春秋》几乎都是《春秋左氏传》。众所周知,《春秋》三传中,《公羊春秋》属今文经学,《左氏春秋》属古文经学。今文、古文两派在东汉后期斗争十分激烈。今文经学者何休好《公羊》学,曾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向古文经学发难,郑玄对何休的理论进行猛烈的抨击。由于郑玄精通今、古文经学,所以对它批评起来鞭辟入里,一针见血。面对郑玄的批评,何休无力招架,只能哀叹:“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2](《郑玄传》)}三国时《左氏春秋》在社会中的广泛影响,正是古文经学的全胜在《春秋》领域里的反映。古文经学之所以大获全胜,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不但文化学术底蕴厚重,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门与当时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学问。它一方面继承了古代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实用性,突出了经世致用的特点。说到经世致用,以郑玄为首的北方学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古文经学中吸取了一些今文经的内容及观点。受这个特点影响,很多公羊春秋的观点也纷纷被人们引用。不过当人们引用它们的时候,不是用今文经学的方法对“微言大义”进行阐释和发挥,而是把它们与当时的社会结合起来,利用它们解决各种现实问题。

(一) 从《春秋》中寻找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根据

东汉末董卓率兵进京,废少立献,后又杀主鸩后,把持朝政。山东各路诸侯纷纷起兵,结成军事同盟讨伐董卓。他们“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

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3](《文帝纪》)

东汉末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权力一步步扩大，后来发展到可以“承制封拜诸侯守相”。汉献帝“赋予”曹操这种权利的诏书说：“其《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专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国家而已。”^[3](《武帝纪》)此诏书发布于建安二十年，此时汉献帝早已成为曹操手中的政治傀儡，“封拜诸侯守相”形式上是“承制”，实质上是曹操自己所具有的权利。这个权力在《春秋》中找到合理的根据。

曹魏代汉，是当时社会生活中重大的政治事件。实现这个转变，不仅要有巨大的政治势力，强大的军事力量，还要有种种堂而皇之的历史依据。在这方面《春秋》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就在曹魏代汉前夕，苏林、董巴上了一道奏章，说天有十二分野代表地上十二国。岁星行至哪个分野，哪国国主就应天命。鹑火是周的分野，周文王始受命，岁星即在鹑火，至武王伐纣，岁星又在鹑火。所以《春秋传》说：“武王伐纣，岁在鹑火，岁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按照这个逻辑，曹操受命讨黄巾是中平元年(184)，这年岁星在大梁，而大梁是魏国的分野。建安元年(196)岁星又在大梁，曹操即拜大将军。建安十三年岁星又在大梁，曹操被拜为丞相。如今岁星又在大梁，这是曹氏受天命的征兆。汉帝禅位于曹丕时，禅位诏书说：“夫命运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来尚矣。”^[3](《文帝纪》)苏林、董巴的奏章是曹氏的旨意，汉帝的诏书也只是借汉帝的名义说曹氏想说的话，都是为曹魏代汉制造舆论的。

吴蜀联盟，共拒曹魏，是三国时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吴蜀夷陵之战后，蜀汉及时调整了政略方针，谋求与孙吴重建联盟，孙吴也倍感曹魏的威胁，希望与蜀国和好。孙吴黄龙元年(229)孙权正式称帝。蜀汉派卫尉陈震去东吴祝贺，公文最后有一句话：“献子适鲁，犯其山讳，《春秋》讥之。”^[3](《陈震传》)意思是当初范献子出使鲁国，因问山名犯了鲁君的名讳，被《春秋》所批评。表示自己不会犯历史的错误，以示对孙吴的尊敬。孙权接受了陈震的祝贺，并与蜀汉订立了盟约，规定灭魏以后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属吴，司州以函谷关为界平分。盟书最后说，这种平分的办法是符合《春秋》“晋侯伐卫，先分其田以畀宋人”之意的。^[3](《吴主传》)从《春秋》中吸取经验，寻找根据，从而使两国结盟这样大事的实现更加顺利。

(二) 用《春秋》的道理上书进谏

董卓之乱起，劫持汉帝至长安。关东诸侯起兵

讨董卓，时王朗任徐州刺史陶谦治中，与别驾赵昱等谏陶谦曰：“《春秋》之义，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3](《王郎传》)陶谦乃遣赵昱奉章至长安。

曹军行军于麦田中，曹操下令不得践踏麦田，犯者死。但曹操马受惊踏入田中，犯了禁令。主簿引用《春秋》“罚不加于尊”之理，主张对曹操例外。^[3](《武帝纪》)

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后又将其杀害。董遇从曹操西征，经孟津，过弘农王冢，曹操不知当拜谒否，顾问左右，董遇乃进谏曰：“《春秋》之义，国君即位未逾年而卒，未成为君。弘农王即阼既浅，又为暴臣所制，降在藩国，不应谒。”曹操乃过而不拜。^[3](《王肅传》)

曹操为魏王，崔琰任其尚书。当时未立太子，曹操爱曹植之才，欲立其为太子。崔琰上书谏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指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3](《崔琰传》)

魏文帝曹丕欲立郭氏为皇后，中郎棧潜上书劝谏。奏书引用《春秋》“无以妾为夫人”、“无以妾为妻”的论述，指出如果仅仅由于宠爱就让郭氏登上后位，“使贱人暴贵，臣恐后世下陵上替，开张非度，乱自上起也”。^[3](《后妃传》)

魏文帝曹丕为太子时，常变异服乘外出田猎。崔琰上书谏曰：“盖闻盘于游田，《书》之所戒，鲁隐观鱼，《春秋》讥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经之明义。”^[3](《崔琰传》)后来鲍勋也说：“昔鲁隐观渔于棠，春秋讥之。虽陛下以为务，愚臣所不愿也。”

魏齐王曹芳嘉平年间，校事之官专横跋扈，他们“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程晓乃上书谏说，校事之官乃武帝在“大业草创，众官未备”情况下临时所设之职，既不符合《周礼》“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要求，又非《春秋传》“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意。朝廷乃接受了程晓的意见，废除了校事之官。^[3](《程昱附程晓传》)

孙吴宝鼎二年(267)，吴主孙皓营造新宫，制度弘广，饰以珠玉，所费甚多，农守并废。华覈上疏谏曰：“昔鲁隐公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戒。今筑宫为长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袭《春秋》之所书，废敬授之上务，臣以愚管，窃所未安。”^[3](《华覈传》)

上书进谏引用《春秋》，以加强自己进言的说服力，可见其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当然，不管进言多么有说服力，都不会百分之百被采纳。上述诸例中也有的谏言未被采纳，但都是当时具体环境所决

定的,不能因此低估《春秋》的影响。

(三) 用《春秋》标准评判各种行为

甘露五年(260),曹髦不满司马昭专权,密谋讨之,反被杀死。事后司马氏又以太后的名义废其为庶人,葬以民礼。司马孚、司马昭等人又上书说:“《春秋》之义,王者无外,而书‘襄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于位也。今高贵乡公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葬以民礼,诚当旧典。”^[3](《高贵乡公纪》)用《春秋》“襄王出居于郑”的记载宣判了曹髦背母乱国之罪。

吴孙休永安六年(263),交阯郡吏吕兴等反,杀太守孙翊。曹魏下诏曰:“昔仪父朝鲁,《春秋》所美。窦融归汉,待以殊礼。今国威远震,抚怀六合,方包举殊裔,混一四表。兴首向王化,举众稽服,万里驰义,请吏帅职,宜加宠遇,崇其爵位。”用《春秋》褒奖仪父朝鲁之事肯定了吕兴背叛孙吴之举。^[3](《陈留王纪》)

公孙瓒的弟弟公孙越受袁术所遣,与袁绍将周昂争夺阳城,并败被杀。公孙瓒认为弟弟之死,根源在于袁绍,乃起兵攻之。出兵前发征讨檄文,宣布袁绍十大罪状,其第九条说:“《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婢使,绍实微贱,不可以为人后,以义不宜”,而却“据丰隆之重任,忝污王爵,损辱袁宗”,用《春秋》母以子贵之义宣布了袁绍污官爵、背祖宗之罪。^[3](《公孙瓒传》)

曹魏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了政敌曹爽及其党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人。宣布曹爽等人之罪说:“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爽以支属,世蒙殊宠,亲受先帝握手遗诏,托以天下,而包藏祸心,蔑弃顾命,乃与晏、飏及当等谋图神器,范党同罪人,皆为大逆不道。”司马懿以《春秋》“君亲无将,将而必诛”之义,给曹爽加上背叛朝廷的罪名和诛杀其党的根据。^[3](《曹爽传》)

曹魏正元二年(255),毋丘俭、文钦起兵讨司马师,并上表曰:“按师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奸慝。春秋之义,一世为善,一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内所书,依古典议,废师以侯就弟。”^[3](《毋丘俭传》)毋丘俭根据《春秋》“一世为善,一世宥之”的记载,采用一褒一贬的手法,宣布了司马师的罪行。

卢植是北方大儒,名著海内,号为儒宗。曹操北征柳城,过涿郡时,派人修卢植墓,进行祭奠。并发令说:“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有异于人。”^[3](《卢敏传》)借以对卢植之子卢毓等人进行褒扬。

蜀汉名将姜维,镇守剑阁拒魏军,刘禅投降后被迫降魏。后又与魏将钟会图谋反魏,失败被杀,家人也受牵连。有一种意见认为,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应该受到讥贬。郤正著论认为,这是凡人誉成毁败、扶高抑下之谈,“异乎《春秋》褒贬之义”,从而肯定了姜维乐学不倦,清素节约的风范。^[3](《姜维传》)

东汉末刘繇任扬州刺史,孙策起兵江东后,刘繇曾与之对抗,后病卒。孙策西伐江夏,还过豫章,收载刘繇之丧,善遇其家。王朗给孙策写信说:“昔鲁人虽有齐怨,不废丧纪,《春秋》善之,谓之得礼,诚良史之所宜藉,乡校之所叹闻。”借以称赞孙策“敦以厉薄,德以报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托”之美德。^[3](《刘繇传》)

(四) 用《春秋》处理各种关系

审配用《春秋》处理袁潭、袁尚兄弟关系。袁潭是袁绍的长子,袁尚是少子。然袁绍偏爱袁尚,立袁尚为继承人。袁绍死后,袁氏兄弟举兵相攻,结果袁潭败。审配党附袁尚,乃写信给袁潭,劝其服从袁尚。信中有两个地方引用了《春秋》,其一:“《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图危宗庙,败乱国家,王纲典律,亲疏一也。”意思是劝袁潭服从袁绍的遗命,作死于王命的忠臣,不要图危宗庙败乱国家,否则即使是亲人也不能逃脱律典的制裁。其二:“昔卫灵公废蒯聩而立辄,蒯聩为不道,人咸以篡,卫师伐之。《春秋传》曰:‘以石曼姑之义,为可以拒之。’是以蒯聩终获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犹然,岂况兄弟乎。”蒯聩是蒯辄之子,蒯聩无道,所以卫灵公不立蒯聩而立蒯辄,蒯辄不从,篡夺蒯辄之位。所以石曼姑率师伐之。审配用《春秋》斥蒯聩为叛逆之事,劝袁潭不要效法蒯聩。^[3](《袁绍传》)给袁潭写信劝其兄弟和好的还有荆州刘表,信中同样也引用的《春秋》。^[3](《袁绍传》)

诸葛亮用《春秋》处理军事统帅与战争结果关系。蜀汉建兴六年(228),诸葛亮率军第一次北伐,由于马谡失守街亭而首战受挫。诸葛亮上疏给后主,其中说道:“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骜,《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3](《诸葛亮传》)诸葛亮用《春秋》责帅之义自贬三等,表现了他勇于承担责任、赏罚严明的作风。

邓艾用《春秋》处理在外军将与朝廷之间的关系。邓艾率军攻破成都灭掉蜀汉之后,由于与在洛阳的朝廷相隔悬远,便自作主张,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厚待蜀主刘

禅以招降吴主孙休。司马昭听说后,便派人告诉邓艾,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应当向朝廷报告,不应独断专行。邓艾回答说:“《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3](《邓艾传》)“大夫出疆”之意前述曹操扩大自己权力时已引用过,此处邓艾又用来处理和朝廷的关系,可见当时人们对《春秋》实用主义的态度。

三国时期,许多政治家、军事家们把《春秋》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及其他领域,体现了古文经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可以说,这也是关羽读《春秋》的动机。关羽读《春秋》,决不是为了当经学博士,而是为了用《春秋》的历史经验为他所生活的现实提供借鉴,用《春秋》的思想为解决他所生活中的现实

问题提供依据。他是刘备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之一,面临着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重要使命,他是独当荆州一面的军事统帅,面临着北伐曹魏、处理与孙吴的关系等种种复杂而艰巨的事物。他虽然熟读《春秋》,但其重要的建树并不在《春秋》,而在于军事,重要的影响也不在《春秋》学问而在其道德情操上。这些事实本身就是对关羽读《春秋》动机的最好说明。

[参 考 文 献]

[1] 梁章钜·《三国志》旁证[M].
[2]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1.

[责任编辑:孟 聚]

Analysis of what was behind Guan Yu's read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LIANG Man-c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Read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ecame a common practice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Many politicians and strategists applied it to political affairs, military affairs and other fields which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plying classical learning to ruling the country. As an important member in Liu Bei Political Group, Guan Yu shouldere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He was a military commander in Jingzhou and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complex and hard task of fighting The Kingdom of Wu. His read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as affected by the social common practice. But his purpose was to tak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it for reference in reality life and apply it to guide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cultivate moral sentiment.

Key words: the Three Kingdoms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pplication of classical learning; political affairs; military affairs